

中央音乐学院

史

1989-1999

中央音乐学院史

(1989 - 1999)

宋学军 王凤岐

中央音乐学院史
宋学军 王凤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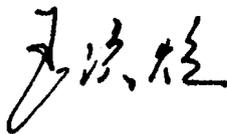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编年纪事
甘亚梅 索承祿 汪 朴



序

中央音乐学院从1950年建院以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在这之前,学院的前身又经历了悠悠岁月。纵观中央音乐学院的历史,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它都清晰地展示出一条开阔的办学思路。从教师队伍建设来看,学院初创阶段的教师由来自南京国立音乐院、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东北的鲁迅文艺学院音乐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上海和香港的中华音乐院和北京的燕京大学音乐系等全国各地的音乐教育人才组成,实际上是综合了当时国内各方面的音乐教育力量。与此同时,一批旅居国外的爱国音乐家和留学生纷纷回国参与创建中央音乐学院。五、六十年代,我院又从教育部争取到一批全国各地选派到前苏联与东欧留学回国的音乐骨干,由此进一步充实和壮大了教师队伍。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从本院选派优秀教师出国进修,另一方面又吸引国外留学生来院任教,同时也从全国各地的院校选用优秀毕业生。因此,可以说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队伍始终是一个开放型的结构。从学术建设来看,历任院长都提出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不仅要继承中华民族的音乐传统,也要借鉴世界各国民族的优秀音乐文化。几十年来,我院一直保持着宽松的学术环境,坚持“双百”方针,广泛进行国际交流;倡导贯通中西、坚持古今交融;积极探索教学改革。90年代以后,学校提出不但要为国家培养高水平的专业音乐人才,同时也要为国民音乐教育做出贡献;相继成立了业余音乐考级委员会、社会音乐教育部、音乐教育系和远程音乐教育中心等机构,进一步拓展了办学思路。

50年来,我院在教学、科研和艺术实践等领域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学校始终以博大的胸怀容纳各种学术力量,并给予它们充分发展的条件。中央音乐学院正是在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意识中不断丰富和壮大自己,这是学校的光荣传统,它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回顾50年的历史,虽道路曲折,但这些传统始终没有丢,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学校的发展,使学校永远充满活力。在50周年院庆之际,让我们进一步弘扬学校的光荣传统,并以前辈为榜样,为在新世纪开创中央音乐学院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目 录

序 王次熠

中央音乐学院史

第一章 概 述	(1)
第一节 揭开教育体制改革的新篇章.....	(2)
第二节 求新、求变, 加快学院改革步伐.....	(4)
第三节 集中精力, 进行全院性的教育体制改革, 全面启动教学改革.....	(6)
第二章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培养全面发展的音乐人才	(9)
第一节 正确处理专业音乐教育中的五大关系.....	(10)
第二节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加强党的建设.....	(13)
第三章 进行全院性的教育体制改革	(19)
第一节 学院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19)
第二节 学院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情况.....	(21)
第三节 进一步深化学院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22)
第四章 深化教学体制改革	(24)
第一节 加强德育工作, 培养德艺双馨的音乐人才.....	(24)
第二节 进一步完善学年学分制.....	(27)
第三节 理顺各教学层次, 加强对研究生的培养.....	(28)
第四节 优化课程结构, 调整专业设置.....	(30)
第五节 加强课程建设, 改进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质量.....	(31)
第六节 进一步完善教学管理制度, 提高教学管理水平.....	(33)
第七节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	(34)
第八节 拓展外事工作思路, 加强留学生工作.....	(38)
第九节 逐步形成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种形式的办学模式.....	(38)
第十节 改进教辅工作.....	(41)

第五章 重视音乐艺术科学研究 加强科研管理	(43)
第一节 成立科研处, 加强科研管理工作.....	(43)
第二节 持续发展音乐艺术科学研究工作.....	(45)
第三节 积极投身艺术实践活动, 为繁荣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事业做贡献.....	(49)
第四节 广泛开展音乐文化交流, 扩大学院的国际声誉.....	(51)
第六章 发展公共服务体系 团结广大教职员工	(55)
第一节 发展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办学效益.....	(55)
第二节 做好工会和老干部工作, 为学院建设保驾护航.....	(56)
第七章 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59)
第八章 风雨兼程 胜利进入“211工程”	(62)
第九章 刘霖与王次炤	(64)
第一节 刘霖.....	(64)
第二节 王次炤.....	(65)
后记	(67)

前五位院领导与中央音乐学院

众望所归的首任院长

——马思聪与中央音乐学院..... 李淑琴 (71)

团结建校 艰苦创业

——吕骥与中央音乐学院..... 宁 静 (77)

为新中国最高音乐学府奠基立业

——赵沅与中央音乐学院..... 黄旭东 (83)

推进改革 扩大交流 加快学院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吴祖强与中央音乐学院..... 李吉提 (91)

求实进取 开拓学院教育事业新局面

——于润洋与中央音乐学院..... 舒咏梧 (96)

中央音乐学院编年记事 (1989—1999)

中央音乐学院编年记事 (1989—1999)..... (107)

附录:《新时代的乐章——接管原国立音乐院》..... 蒋向红 (292)

后记..... (296)

第一章 概述

中央音乐学院四十岁生日的蜡烛刚刚吹熄,转瞬又迎来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五十华诞。十年,弹指一挥间。

在这十年里,我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健康发展,国民经济体制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得到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文化艺术事业繁荣向上,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这十年里,我国的教育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了第二、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993年和1999年),确立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6)等重要文件,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1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3)等教育法律、法规。与此同时,艺术教育也愈来愈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文化部召开了以“改革与发展”为题的第三次全国艺术教育会议(1996.8)。李岚清副总理在会上强调指出:“艺术教育是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教育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反映。专业艺术教育是培养专业艺术人才的摇篮,加强专业艺术教育,对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民族和整个国民素质、推动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等,都发挥着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特的重要作用。”

在这十年里,中央音乐学院历经三届领导班子,在他们的领导下,在全院教职员工的努力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根据国家教委提出的“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核心,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改革是先导”的方针,三届领导班子带领全院教职员在继承和发扬学院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内部管理体制和教学体制的改革,全面推进学院的改革与发展,为把学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国际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音乐学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在这十年里,中央音乐学院的建设与发展,也是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分不开的。李岚清副总理分管文教工作以后,对我院的建设非常重视。1995年10月20日,他在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文化部副部长陈昌本、北京市市委副书记李志坚等有关领导的陪同下,来我院考察工作。当他了解学院的困难

后,提出建议国家教委把音乐教育列为特殊教育,“特事特办”。考察结束后,李岚清副总理为我院题词:“向献身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同志们致以敬意,希望进一步办好中央音乐学院,为培养更多的优秀音乐人才作贡献。”同年底,他还委托对外经济贸易部赠送我院一批音像制品及设备(CD 唱片、投影仪、影碟机、录相机、音响器材)。十年来,李岚清同志对我院的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附中危房改造的如期完成,附中新校舍、大礼堂修建及“3401”(宿舍新六楼)工程的上马,都与他的关心与支持分不开。他不仅关心学院的物质文明建设,帮助学院协调解决基建问题,同时,他对学院的思想建设和教学工作也十分重视。为了提高师生的“文艺修养及爱国主义情操”,他亲自写信推荐描写音乐家肖邦的电影《一曲难忘》。他还经常出席我院师生的音乐会,1999年9月10日,他还专程到我院声乐系九十高龄的喻宜萱教授家为其祝寿。另外,对于我院的“211工程”申报工作,他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李鹏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对我院的工作也十分关心和重视。他曾于1996年底与王光英、李铁映等领导一道出席庆祝指挥系建系40周年的《欢乐颂》大型音乐会。音乐会之后,他还欣然为我院题词:“发展音乐教育事业,培养跨世纪艺术人才”,并拨款五百万元用于学院乐器的更新。十年来,社会各界对我院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许多企业和个人以各种形式为我院捐资、捐款。1990年,学院还成立了“中央音乐学院校友会”,遍布国内外的校友们都十分关心学院的建设,为我院与外界的交往架起了一座桥梁。

第一节 揭开教育体制改革的新篇章

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其博大的襟怀、宽阔的视野和高远的心智,于1983年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对中国教育发展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战略方针,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战略方针为新时期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引发了中国教育界的一场革命。1984年和1985年,中共中央相继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改革的决定,在这两个决定的推动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持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上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5.27)。《决定》确立了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发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号令。《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为了改变教育事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不仅要“改革管理体制”,还要“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文革”以后,中央音乐学院经过恢复重建时期逐步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三个面向”的伟大战略理论的提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给学院带

来了勃勃的生机，同时也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1983年，作为艺术院校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中央音乐学院开始改革的酝酿工作。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提出的“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的精神，中央音乐学院在全国艺术院校中率先试行院长负责制（院长吴祖强）。社会主义学校的校长负责制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包括校长对学校全面负责，党支部起保证监督作用和教职员工参加民主管理三个有机部分。它既强调党政分开、各司其职，又重视党政协调、密切合作。行政工作在党委的支持下充分独立的运转，党委则从过去包揽一切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把精力集中到党的自身建设和涉及全院方针性大事的研讨和决策上。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根本目的，是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高效率的行政指挥管理系统，充分发挥校长统一指挥、党支部保证监督、教职工民主管理的三位一体的管理功能，把学校办出特色，大力提高教育质量。随着校长负责制的确立，中央音乐学院有计划、有步骤、积极而稳妥地进行了行政管理体制和教学体制的全面改革。

1988年9月，文化部及北京市委分别任命于润洋为院长，潘一飞、刘霖为副院长，陈自明继任党委书记，徐士家任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组成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任期为四年。

这四年是历经风雨、不平凡的四年，东欧和苏联的解体，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政治动乱，高等院校是重灾区；汹涌而来的商业大潮使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冲击，青年人思想困惑迷惘，人才大量外流。面对这些困难，党政领导同心同德，积极努力，使学院既保持了稳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于润洋出任院长以后，基于“三个面向”的战略思想，制定了《中央音乐学院1988-1992年工作规划》，提出学院在新时期的办学任务：“为我国社会主义音乐事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较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把我院办成国内一流的、国际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学府。并为我院跨入世界专业音乐教育的前列这一目标打下基础、创造条件。”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学院加强了基本建设，成立了“教教职工代表大会”，出版了建院以来第一部《中央音乐学院现行规章汇编》（1992年春），使民主与法制建设更加深入。《中央音乐学院现行规章汇编》由班恩敏主持编辑，汇集了90年代前后学院制定并发布实施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共83件，包括行政党务、劳动人事、教学科研、学生管理、教学设施设备、档案、安全保卫、财务、总务、附中等十大类。它为不断克服经验主义和主观随意性，实现真正的制度化、科学化管理打下了一个基础。为了加强全院师生的凝聚力，学院还提出了“勤奋、求实、团结、进取”的八字校训。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在1989年的那场动乱中，学院成为北京市最早复课的高校之一。在这四年里，学院还进一步完善了学年学分制，加强了科研管理工作（成立科研处），顺利完成了两万九千平方米教教职工宿舍楼建设和分配工作。1991年11月，中央音乐学院被授予全国文化单位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1990年6月15日学院隆重举行了大规模的建院40周年暨国立音乐院建院50周年的庆典活动，盛况空前。

第二节 求新、求变，加快学院改革步伐

进入90年代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无论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讲，90年代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此，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不仅确定了90年代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为了实现党的十四大所确定的战略任务，指导90年代乃至下世纪初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 2. 13）。《纲要》提出了在新的形势下教育工作的任务，并强调“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995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正式把它定为我国的教育方针）。《纲要》还指出，“为了迎接世界科技革命的挑战，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力争在下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和管理方面，达到世界较高水平。”（即“211工程”）

1992年7月，学院领导班子按时进行换届，按照上级要求，由原来实行的院长负责制转变为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新一届院领导班子由徐士家^①（党委书记）、刘

^① 徐士家生于1936年10月。上海市人。音乐史学家，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北京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聂耳冼星海学会会员、中国音乐史学会会员、马思聪研究会副会长、萧友梅音乐研究会副会长。1961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理论学科。同年考入该院音乐学系，主攻中国音乐史。1966年毕业于，下放劳动锻炼。后调回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历任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史教研室副主任、理论作曲系副主任、教务处长、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党委书记。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要成果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1997）、《中国现代音乐史纲》（合作，1991）、《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参考资料》（主要编者之一，1986）等。主要音乐论文有：《海陆丰农民运动中的歌咏活动》、《关于任光生平的一些史料》、《江文也教授和他的音乐创作》、《辛勤耕耘在音乐理论园地里——记汪毓和教授》、《内心的袒露、时代的记录——读冼星海的日记》等。曾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撰写“沈心工”、“向隅”、“江文也”等人物条目及《音乐教育》、《民族音乐》等期刊条目。曾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音乐欣赏》（续集）撰写江文也教授《台湾舞曲》、《汨罗沉流》、《小品16首》、《北京万花集》等音乐作品的赏析条目。与人合编有冼星海音乐论文集《我学习音乐的经过》（1980）。曾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编写两部大型系列音乐广播节目的文字稿《在歌声中前进》及其续集（合作）。

霖（院长）、左因^①（副书记兼副院长）、王次炤（副院长）、孔庆先^②（副院长）组成，任期四年。从总体上看，这四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取得巨大成绩的四年。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法制的不断健全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新旧体制的相互碰撞、新老观念的互为摩擦中，这些年来，社会上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及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有所抬头。对于学校来讲，则出现了办学经费紧张、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退减等问题。在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面前，本届领导一上任，便在《中央音乐学院1992—1996年工作规划》中明确指出：“我们要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遵循艺术教育事业的规律，积极、稳妥、有步骤地采取各项改革措施，使学院的各项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并努力争取进入国家教委设置的‘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同时，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不断提高学院的学术、科研水准和教学质量，提高办学效益，为国家培养出更多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我们的基本任务。为完成这个基本任务，我们首先要通过内部管理体制转换机制，充分发挥全院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教学、学生思想教育管理、后勤服务等方面的改革。”“我院将在校舍、师资等办学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配合国家需求，适当扩大办学规模，培养相当数量的高质量人才。同时，要积极探索多种办学形式。努力开展联合办学，社会音乐教育和海内外音乐分级考试，争取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个工作规划（《中央音乐学院1992—1996年工作规划》）充分体现了本届领导稳健、求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在以后的四年中，该规划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学院启动了内部管理体制变革；进一步延续深化了教学改革；探索了以实行承包制为内容的后勤改革，开展了以“学生定额收费”为起点的学生管理工作改革。1995年，学院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庆祝建院45周年的活动。

① 左因生于1940年5月10日。原籍湖南湘阴。1951年以钢琴专业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195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并被保送升入中央音乐学院本科。1960年被国家选派到前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深造，专修竖琴专业，并选修管风琴专业，于1965年毕业并获优秀毕业生证书。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后升任教授。她是中央音乐学院竖琴专业创始人，30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许多竖琴人才，他们在全国各地文艺团体和艺术院校起着骨干作用。她从编写教材到教案，完成了从白丁到研究生教学的全过程。她所培养的学生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有些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她还担任弦乐四重奏的教学工作，她所指导的女子弦乐四重奏组曾于1982年在英国朴茨茅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中获评委主席奖。左因教授作为中国第一代竖琴演奏家和管风琴演奏家曾与中央乐团管弦乐队和室内乐团等录制、演出竖琴协奏曲和管风琴协奏曲。1983年9月至1988年12月左因先后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和附中校长。在担任附中校长期间于1988年9月和1989年1月曾两次率领中国少年交响乐团出访瑞士、意大利、澳门等国家和地区演出，获得成功，为祖国赢得荣誉。1992年2月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1996年调任中国交响乐团副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② 孔庆先先生于1944年6月。山东烟台福山区回里镇刘家庄人。1952—1964年在原籍上学、劳动。1964—1970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任战士、分队长。1970—1973年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学习、工作。1973—1992年先后任中央音乐学院保卫组长、科长、人事保卫处副处长、纪委副书记兼保卫部长。1992—1996年任中央音乐学院行政副院长。现任职于该院社会音乐教育部。

第三节 集中精力，进行全院性的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启动教学改革

90年代后半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对教育自身的不断探索，社会各界对教育在社会、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以及素质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愈加深。1999年，为了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进一步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6.13）。《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使受教育者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加强书本知识和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思想和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进步，是我国教育事业跨世纪的一场深刻变革。

1996年12月，我院组成了跨世纪的新一届党、政领导班子：党委书记（空缺）、院长（空缺），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次炤（主持全院工作及教学、科研、人事等工作），副院长刘康华^①（主持外事、社会教育部、科技中心、演出中心工作），副书记郭

^① 刘康华为作曲系教授。1949年生于上海市。1973年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江定仙、王震亚、黎英海、赵行道等教授。1977年留院任教，主要从事作曲技术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88—1990年由国家公派至前苏联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学习，师从尤·赫洛波夫教授学习20世纪的作曲技术理论。1991年任和声教研室副主任。1992年任作曲系副主任。1993年任作曲系主任，1996年兼任院长助理。1996年12月起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作曲技术理论教学工作，并指导硕士研究生的理论研究工作。作有钢琴曲《蓝花花》、《秋江箫吟》，并为影视作曲。主要论文有《格里格的半音和声技法与风格》、《20世纪和声的共同逻辑原理与分析方法》、《欧洲调性体系的演变》、《20世纪的中心和声技术》、《罗斯拉维茨的中心音列技术》、《郭文景室内歌剧〈狂人日记〉和声研究》等。编著有和声教材及多种和声辅助教材。在1997年于上海举行的“97”国际音乐学院院长研讨会上，做了题为〈音乐教育与21世纪——培养高素质的音乐专门人才〉的报告。在1998年于日本东京举行的“亚洲音乐教育国际研讨会”上，做了题为〈中国音乐教育的传统与变革〉的报告。在2000年于台北举行的“21世纪社会音乐能力与教育发展两岸交流研讨会”上，做了题为〈21世纪社会音乐教育之展望〉的报告。1995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1997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表彰证书及政府特殊津贴。

淑兰^①（主持党务及学生工作），副院长李续^②（主持后勤、财务、创收、离退休）。1998年7月，文化部对这届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王次炤任院长、吴祖强任名誉院长、陈南岗^③任副院长兼附中校长，其他副院长、副书记职务不变。1999年1月，党委、纪委进行换届，经全体党员选举、中共市委组织部批准，组成中央音乐学院新一届党委和纪委：党委书记王次炤，副书记郭淑兰，委员有刘康华、李续、陈南岗、张小松、雷蕾、刘培彦、俞峰；纪委书记郭淑兰，副书记雷蕾，委员有汤桦、李鲁明、王文书。

世纪之交，全国的教育工作加快了前进的脚步，新举措、新变化层出不穷，学校间的竞争也愈加激烈。近几年来，全国各音乐院校的发展都较为迅速，进步都比较大。作为全国唯一的一所重点艺术院校，中央音乐学院虽仍保持着一定的实力，但其所具有的优势已不比从前。面对逼人的形势，学院跨世纪的一届领导集体，向全院师生发出了“面向未来、抓住机遇、求真务实、发展自己”（《王次炤在全院党员大会上的讲话》1999年1月）的号召。为了适应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建设对多种人才的需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本届领导在任期工作规划中提出了“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的综合性开放式的办学模式，完善并巩固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21世纪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音乐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努力使音乐表演、作曲、音乐学等学科领域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使音乐教育、音乐科技等学科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把学院建设成为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中国音乐艺术教育中心”的总体建设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学院要进一步做好以下几项工作：加强理论学习，用邓小平理论统一全院教职员工的思想；精简机构、

① 郭淑兰于1955年生于吉林省突泉县。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家乡参加劳动锻炼。197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学习。1980年于该校毕业后分配至文化部教育司工作。先后任《艺术教育》编辑、研究室副主任、规划处处长。1996年底调任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1980年至1996年，主要从事艺术教育政策法规、艺术教育史、艺术教育家和艺术教育管理方面的研究，并撰写了这方面的政策法规、人物介绍、理论探讨等文章60余篇。在改革法规方面，研究制定了《高等艺术院校（系）招生暂行规定和补充意见》、《国家级重点中等艺术学校评选标准》、《普通中等艺术学校招生暂行规定》、《艺术院校招收推荐免试生的办法》等；在艺术教育史、艺术教育家介绍方面，发表了《艺术教育四十年》、《蓬勃发展的中国艺术教育》、《中国版画教育的开拓者李桦》、《赵枫同志对音乐教育的几点意见》、《新星从他手中升起——访林耀基教授》等文章；在艺术教育管理方面，撰写并发表了《艺术院校办学形式的新发展》、《艺术院校的发展趋势》、《文化部教育事业“九五”和2010年发展规划》等。还与人合作编著出版了《艺术春秋》，总编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简史集》，主编《高等美术学院、系高考指南》等工具书、史书。尚参与了《中国文化对外交流概览》、《中国教育行政管理全书》中艺术教育部分的撰稿。

② 李续于1952年8月27日生于北京。1965年9月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歌舞团学习舞蹈，毕业后留中国铁路文工团歌舞团任舞蹈演员。1980年考入北京舞蹈学院攻读中国古典舞教育专业，毕业后留北京舞蹈学院任教师、院办副主任、附中总支书记、产业办副主任、院长助理。1996年12月18日调中央音乐学院任行政副院长。

③ 陈南岗，女，原籍贵州，1946年9月出生于哈尔滨。195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钢琴学科，1964年附中毕业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1969年毕业于并在中央音乐学院参加工作，主要从事钢琴教学与演奏。1970—1973年间，随学院赴38军农场劳动锻炼。1973—1979年，任湖北省歌舞团乐队演奏员。1979—1990年，任教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1985年获全国聂耳、星海声乐作品比赛优秀钢琴伴奏奖。1990年调入中央音乐学院任钢琴伴奏教师，1995年9月被评为副教授。1992年9月—1999年7月，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党总支书记。1993年9月—1995年7月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从1995年7月起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1998年12月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兼附中校长。

理顺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改革人事与分配制度，建立人才竞争机制；修订教学方案，提高教学质量；调整科研管理体制，密切科研与教学的联系；加强德育和学生工作，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接班人；加大后勤改革力度，推动后勤工作社会化；在办好学历教育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开发学院的教育资源，逐步形成以普通学历教育为主体、继续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为辅助的综合性、开放性的教育体系；抓好“211工程”的学科建设和围绕学科建设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尽早促成我院“211工程”的立项。本届领导班子虽然任职还未期满，然其所取得的业绩已是可圈可点：“211工程”的立项；附中新校舍动工；完成五号楼翻建工程；“3401”自用土地采取集资方式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建房工程开工；制订和修订了68项重要的规章制度（不含附中）；文明校园建设规划开始实施；大型音乐辞书《音乐百科全书》编纂工作正式启动等。

第二章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培养全面发展的音乐人才

素质教育的提出，有其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进入 90 年代，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的渐露端倪，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流，但是我们的家园并不太平。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综合国力的竞争愈发激烈，与过去不同的是，除了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竞争以外，文化与文明的竞争也已凸现出来。21 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也是人才竞争的时代，知识和人才、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将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就文化艺术而言，由于思想认识、资金投入等诸多因素的局限，发展相对较为缓慢，与时代的进步，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距离。近几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1996 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民族只有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才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是事关中华民族振兴的大问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一基本纲领的提出，突出了文化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江泽民在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 年 6 月 15 日）谁掌握了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 21 世纪的国力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历史赋予了教育，特别是艺术教育以光荣的使命。

音乐教育是培养音乐人才的崇高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音乐教育就是明天的音乐事业。长期以来，专业音乐教育存在着专业设置过窄，教学手段单一，重经验轻理论，重技艺轻文化等现象，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培养跨世纪音乐人才的社会需要不相适应。因此我们说，音乐教育也有一个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问题。李岚清同志曾指出：“艺术院校的毕业生走上社会以后，无论是

从事专业文艺工作还是艺术教育工作，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肩负着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重大使命。他们的整体素质如何，对社会、对青少年的影响都极大。因此，抓好艺术院校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具有更特殊的重要意义。”（1996年8月20日在接见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如何在音乐学院中推行素质教育，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音乐人才，这也是近十年来学院领导一直思考的问题。

21世纪作为一个“财富源于人力资源”的新时代，对人才的素质构成是极其“苛求”的。素质教育以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科学文化、身体、心理和劳动技能素质，培养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创造性为宗旨，彻底摒弃了片面的应试教育观，它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保健、学会审美打下扎实的基础，并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素质教育是侧重未来的教育，它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的，追求教育的长效性。

第一节 正确处理专业音乐教育中的五大关系

积多年办学之经验教训，并根据素质教育的内涵及特点，在培养专业音乐人才的问题上，院领导明确指出，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更新音乐教育思想、更新观念，在专业音乐教育实践中学会如何正确处理好专业音乐教育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始终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提高社会主义专业音乐教育的水平，实现办院方针。《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2年第一期发表了于润洋的文章《对高等专业音乐教育问题的思考》，论述了如何处理做音乐家与做人、一般文化与音乐文化素质与专业主科、基本功训练与发挥创造性、民族音乐素养与学习西方音乐文化以及教学与科研等五大关系，无疑是带总结性的、密切联系专业音乐教育实际的，并具有指导性、科学性的一篇论文。

做音乐家与做人的关系

如何完成高等音乐学府的历史使命，其尖锐地摆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做人与做音乐家的问题。即能否在整个办学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把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上，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大问题。反思20年来学院教育工作中的得失，最大的失误在于思想品德教育，这个问题应始终是值得我们首先认真思考和探索，并在实践中努力寻求解决途径的问题。

因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除了在技能方面必需具备的条件之外，他还必需具备一种最重要的品质，那就是：他首先应该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有丰富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人民怀有深厚情感的人。我们很难设想在我们的社会，一个毫无理想、思想浅薄、贫乏、狭隘，只考虑个人私利，对国家、民族、人民感情淡漠的人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艺术家。”“纵观古今中外音乐艺术领域中堪称之为真正大师的人，无论是作曲家、理论家还是演奏（唱）艺术家，其中大多数都

是思想深邃、丰富，品格情操高尚，对自己的祖国、民族怀有深厚感情的人。尽管时代、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某些概念的具体内涵也有所不同，但是，这些品质在不同程度上都往往是历代真正音乐艺术家所共有的。”

何以这个问题尤其在当今更为突出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呢？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外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艺术思潮的大量涌入，近年来国际大环境的种种变化，这一切都势必对我们的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直到整个的价值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的任务，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如何使我们的学生在思想品格方面，达到做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所必备的条件，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音乐建设事业的需要，就突出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尽管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有国际大气候的影响，更有国内诸多社会原因，但也要看到，学校的德育工作、对学生的管理工作、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教育工作在建构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上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一个学院的良好的学风和教师的言教、身教对学生产生的细微以至极为深刻的影响。作为教育中占主导地位的教师，必需要具有这种使命感，以承担起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努力将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融入自己的业务教育中去，既要各个方面热情地关怀他们，又要严格地要求他们。于润洋同志深情地回忆其在五、六十年代做学生时的成长过程中，老师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对如何做人、如何治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般文化、音乐文化素质与专业主科的关系

是把音乐学院办成一个只是专门进行音乐技术训练的“技术养成所”，还是办成一所培养既具有坚实的技术训练功底，又具有良好文化（包括音乐文化）素养的未来艺术家的真正的“学院”？这无疑对学院领导、老师和学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不仅我国有，而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音乐学府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这个问题，尤以中国最为严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不可等闲视之。

多年来，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一般文化课甚至专业基础课程重视不够、要求不高，造成其专业基础训练水准甚高，而文化基础却相当薄弱，形成文化素质与专业训练失衡的局面。从长远看，后果将是严重的：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将来可能是一批训练不错，但整体文化素质（包括音乐文化素质）低劣的“音乐匠人”，而不是真正够格的“音乐家”。很多现象已经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学生从小学、中学到本科、研究生，为什么愈是到更高的层次就愈显得有些后劲不足；在历届国际音乐比赛中，尽管取得了国内外令人瞩目的良好成绩，但也已突出地暴露出我们的一些弱点，其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参赛者往往在技术训练和功底上并不比外国的选手差，但对各个不同时代、不同作曲家作品的风格掌握、对作品内在结构的认识、对作品蕴藏的思想感情内涵的理解等往往都显出不足，从而不能达到对乐曲的完美表现。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文化素质（包括音乐文化）问题。艺术毕竟不是技术，音乐是人的心灵的声音。因此，我们不能设想，一个虽有良好的技术功底、熟练的手指、漂亮的嗓音，而文化素质贫乏、对音乐历史一知半解、对音乐文化孤陋寡闻的人能够对伟大的音乐作品有深刻的理解和表